

松柏长青 英名永存

——杨松柏烈士传略

张保友 王国启

“啪，啪，啪，啪，”刑具鞭击皮肉声夹杂着打手们“说不说”的嚎叫声，从国民党许昌县署监狱的刑讯室内传出，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刑讯室内，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被悬吊在大梁上，衣衫褴褛，头发散乱，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微微点地的脚尖还在不停地滴血……他正处在昏迷中，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打手的臂上、脸上也都溅满了血。一个略显疲惫的打手放下刑具——钉满铁钉的竹板，将一盆凉水向吊着的人猛泼过去。那人猝然醒来，昂然抬起头，一双向外鼓突着的大眼睛怒视着凶残的打手，厉声喝道：“打吧！打死老子也不会屈服。老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想从我口中得到一点东西，万不可能！”两个打手不等他再说下去，便又扬起满是铁钉的竹板，左右开弓。霎时间，刑讯室的墙壁上、各种刑具上都染上了殷红的血点。任凭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这位坚强的志士始终没有屈服。他，就是半月前被敌人搜捕的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巡视员杨松柏。

杨松柏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投身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26年投考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中曾任宣

传队员、排长，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河南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历任河南省互济会特派员、河南省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洛阳中心县委宣传委员、许昌中心县委常委、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等职。无论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还是在敌人的牢狱里、酷刑下，他无私无畏、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

杨松柏 1901 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往流集西后街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原名云鹤，字仲白，又名宗白、维新，随母姓曾化名沈子平，松柏是他投考黄埔军校时改用的名字。高曾祖父四代均膺清朝举秀功名。父亲杨郁周（名焕文）毕业于河南省立优级师范，是固始县名重一时的清末废科举、兴新学的大力赞助者和推行人之一，并经手创办固始县立旧制中学，首任校长。他为人耿直公正，尤其是经济、文章、举县推重，深得社会各界的赞许和爱戴，为固始县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母亲沈氏系出名门，为颍淮古镇朱皋集之望族闺秀，娴礼义、知诗书、洞达世情。杨松柏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兄长孟丹，三弟叔青，四弟季立。

杨松柏的青少年时期，正值贫困的家庭刚有转机而又遽然没落之际。贫困的生活刺激他发愤攻读，自强图存。他七岁入私塾，兼受教于母，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学根底。稍长，

即熟读楚辞、汉赋、唐宋诗文，涉猎诗子百字，并写得一手好颜体字，常与同学和诗属对。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不暇嬉游，整日埋头书斋。天冷时常常忘记加衣，竟置夹衣、棉衣于不顾；天热时常常忘记轻装，仍衣冠整齐，正襟危坐，苦读于灯前。旧历正月十五，街上划旱船、玩龙灯，窗外锣鼓喧天，万头攒动，他不听不看，读写不辍。他的脾气有些怪：平时与亲友不苟言笑，口吃，易怒，怒则双目圆睁，给人以森严可畏之感。尤其是父亲的亡故，家庭经济生活日趋拮据，更使他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忧郁。但他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敬重尊长，友爱弟妹，嫉恶如仇。因其待人或谦或慢，不可捉摸，亲友街邻背地里称之为“二别子”。

1918年，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到了古蓼城乡，荡起了松柏的思想涟漪。他再也不安心在家乡小镇上埋头读书了，便考入固始县城旧制中学。在县城旧制中学四年学习中，他一方面努力学习数理化 and 英语，考试常常名列前茅；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的报章书刊。他十分敬重教国文的李静禅老师。李老师毕业于河南大学，他不仅向学生传授新知识，而且还经常介绍一些新思想，编演以反对封建礼教与迷信等为内容的新戏……这些，使杨松柏的耳目为之一新，视野顿觉开阔。但李老师的言行却不为封建势力所容。当时固始的官绅许兰阶、吴厚斋、赵继仁等视李静禅若眼中钉，千方百计排挤中伤，迫使李老师离开固始去开封。这引起了杨松柏的

沉思。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中旬，一批大学生由外地回固始，在县城组织了由固始中学、模范高等学堂、大佛寺女子高等学堂和部分乡镇学校的师生一千余人参加的声援“五四”运动的集会，并成立了固始县学生联合会。杨松柏的热血沸腾了。他和师生们一起，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卖国贼！”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此后，固始县学联创办了《青年周刊》，传播马列主义与进步思想。城关各校师生在学联的组织和领导下，多次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反对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查禁、焚烧日货，一时革命的烈焰腾空而起。实际斗争的锻炼，使杨松柏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爱国激情顿然高涨，追求革命的心情益切。这为杨松柏后来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初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杨松柏中学毕业后，限于家庭经济力量，未能立即投考大学，回乡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员。不久，即与固始城关的许家之女订亲结婚。1925年，许氏生子培根。

二

“五四”运动风暴的震撼，新文化思想的熏染，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这一切无时不搅起僻居乡间小学校教书的杨松柏心中的浪花，每当忆起那些轰轰烈烈的动人情景，杨松柏便思潮奔涌，感奋不已。面对现实，他又不禁忧心忡

仲。近代中国饱经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尤其河南地处中原，历经祸乱，连年的军阀混战，兵匪骚扰，不知有多少人家在兵荒马乱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加之经济窘迫的家境每况愈下，更使他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现实的丑恶。因此，他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自许。为了寻求出路，在教书之余，他广泛地阅读同学好友从外地寄来的进步书刊，从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从各地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中，他又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前途和希望。

为酬报国之志，1926年初，杨松柏毅然辞别了妻子和刚满七个月的儿子，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松柏进入黄埔军校后，经过努力学习和刻苦锻炼，一改过去那种闷声不响、不苟言笑的性情，竟变得谈笑风声，口若悬河，多年的口吃也得到矫正。过去的熟人和他重逢后，无不钦佩他的革新精神。有人开玩笑说他是“福至心灵。”总之，在找到革命道路之前，他牢骚满腹，异常苦闷；投身革命以后，他心胸开阔，精神格外振奋。“七一五”事变前，杨松柏随第一路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任宣传队员。他采用大众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北伐意义和我党的政治主张与方针。那激昂慷慨的神态和富有鼓动性的言辞，谁还能相信他曾是一个期期艾艾的“古板”人呢？在北伐革命中，杨松柏曾一度充任国民革命军排长，历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

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城，打败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正式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红都。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形势的发展，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逐渐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暴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5月17日，原属武汉政府所辖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也在宜昌率部叛变，进攻武汉。在共产党员叶挺的指挥下，卫戍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农讲所的学生军，齐心协力，击退了叛军，武汉政府转危为安。在这次讨伐夏斗寅叛乱之役中，杨松柏曾荣获战功。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地区进行反革命屠杀。至此，“蒋汪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导致失败。“七一五”事变后，杨松柏又随军东征讨蒋，不料所部中途被缴械，未及赶上“八一”南昌起义。为此，他引为终身憾事。事后，每当对人言及此事，总不免发出“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感叹。

杨松柏等人被缴械以后，由于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便联络了往日彼此了解的革命同志，结伴潜回武汉，意

图东山再起。殊料昔日赤都，一夜之间竟变为恐怖魔窟。在汪精卫集团提出的“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工农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所有的革命团体均被反动派封闭，武汉城笼罩于腥风血雨之下，已不可居留。为此，杨松柏等人便受党组织的派遣，赴河南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三

1927年秋，杨松柏回到了家乡河南固始。正值共产党员王子春（河南农专毕业）受党组织派遣，在固始中学担任校长，进步教师张纯修（杨松柏兄长孟丹的同学）任教导主任，共产员蔡仲美、汪涤源等受聘执教于该校，并已组建了中共固始县委，蔡仲美任书记。杨松柏在城关与蔡仲美、王子春等取得联系后，便参与了县委的秘密活动。他们经常在张纯修的家中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并不断发动进步师生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先后扳倒了学霸魏竞西（劝学所长），严惩了侵吞教育经费的县长袁经圃，揪斗了贪赃卖法的县承审员（当时管司法的）邓孔有，使固始的地方反动势力威风扫地，贫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固始中学对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地方官绅非常害怕。县教育科便派了一名特务任固始中学的军训教官，秘密监视进步师生的行动。1928年3月18日，潢固商三县交界处的大荒坡农民暴动失败，不久，在固始中学任英文教员的

汪涤源（县委成员，商城武桥人，曾任信阳中心县委书记）也被捕牺牲。固始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杨松柏、王子春因身份暴露，同时离开家乡。

1928年春，杨松柏在开封找到了党组织。根据需要，省委决定让他从事互济会工作，并指示他找关系设法谋一合法职业作掩护。当时河南省教育厅长张鸿烈（字幼山，固始人，留美博士）与杨松柏有瓜葛之亲，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王硕甫又是杨松柏父亲的故交，正好该部有一个股长的空缺，杨松柏便很顺利地和社会教育推广部担任了宣传股长之职。从此，他便以公务人员的身份出入于开封社会界，秘密地从事着党的红色互济会工作。

红色互济会，又称济难会，“是一个广泛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号召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作援助、救济革命斗争的组织”。它的基本宗旨是“反对白色恐怖，铲除白色恐怖的组织者国民党、帝国主义”；主要任务是“援助一切革命斗争”，“救济困难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号召互济运动”，“反对一切伪慈善团体及伪人道宣传”，“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杨松柏在从事互济会工作期间，为营救被捕入狱的革命同志，他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利用合法的身份奔走于社会各界，使不少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重新回到战斗岗位。这年夏秋，在地下党组织及中共巡视员的正确领导下，省互济会的营救工作卓有成效，仅在开封的“政治犯”就有二百余人取

得释放，大部分安排、介绍了工作。为了救济困难同志的家属，杨松柏不惜动用自己的月薪。当时，他的经济收入较优裕，他便主动拿出一部分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他经常出入于上层社会及娱乐场所，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革命者，就连他的好友张纯修到开封见了也颇感诧异：“仲白兄真阔，怎么做起官来了？”杨松柏付之一笑，好友也会心地笑了。这期间，杨松柏为发展红色互济会做了大量工作，他以宣传股长的合法身份借推广社会教育之名曾到豫东、豫中及豫西各县深入广大工人农民中，发动群众，建立起红色互济会的基础组织，并借助于这一“广大的群众组织”方式，力争“使一切的革命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杨松柏出色的工作，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得到党组织的嘉许。1928年底，由于党内出了叛徒，河南的党、团省委均遭严重破坏。1929年4月，中央鉴于河南省委遭到多次破坏，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各地工作由党中央直接指导，全省划为豫南、豫中、豫北三个中心区域，九个中心县委。此时，党组织又指派杨松柏以省互济会特派员的身份到豫西参与洛阳中心县委的工作。

杨松柏到豫西后，任洛阳中心县委宣传委员，被安排住在洛阳老城后卫街的蜂厂（我党地下机关、对外称“养蜂传习所”），有时住县立一小。在洛阳，杨松柏首先着手指导洛阳全县的互济会工作。他找到在洛阳县立一小工作的张友仁

（地下党员），认真检查了一小互济会（有两名党员和三名非党员）过去工作情况，并具体布置了今后的任务。

由于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多次遭破坏，我们的同志或被捕牺牲，或因身份暴露而外调，干部奇缺。在征得上级党组织同意之后，杨松柏在县立一小借办养蜂传习所为掩护，办了一期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并借以整顿党的组织。这批干部后来分赴洛阳中心县委所辖各县，大多成为领导各地群众斗争的骨干。

四

1930年5月以后，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揭幕。陇海沿线，尤其是豫西的城镇及广大农村，人民饱经战祸，流离失所，洛阳的反革命统治也因连年战争遭到削弱。豫西的这种动乱局面非常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豫西暴动，建立红军。

冬，党中央派张委员到洛阳主持建立了以中央先期派来洛阳的史慧丰为首，杨松柏、昌渊亭（曾任建国豫军参谋长）、郭显坤（曾在镇嵩军及西北军任营长等职）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直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地址设在蜂厂。

军委会成立后，洛阳中心县委把一切工作重点都转移到暴动的准备工作上来，河南省委也将豫西暴动作为当时首要工作来抓。杨松柏等同志经过七八天的紧张筹备，由张委员、

史慧丰主持，在洛阳城西北角煤土坑召开了军委成员、党、团、互济会及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中共河南省委也派了四位代表参加。张委员代表中央报告了各地起义情况及红军、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分析了蒋冯阎大战后整个豫西和陕东对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传达了中央对豫西暴动的具体部署：迅速武装起来，领导穷苦大众，打出红旗，建立红三十六军，成立苏维埃政权。接着，军委负责人史慧丰讲了豫西暴动成功的意义：可以和豫南苏区连成一片，既策应配合河北农民暴动，又与南方革命斗争相呼应，在各方面都能造成一股很大的影响。军委成员又分头听取了各县县委的汇报，最后，军委会要求：将这次会议精神尽快传达下去，并首先由党员、团员、互济会员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武器，建立武装组织，同时应秘密地搞好宣传动员，迅速发动群众，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会后，军委会制定了行动方案：首先，在洛阳敬事街小学开办军事训练班（对外名为养蜂传习所），训练军事干部。第二步是发动兵变。当时豫西一带所驻杂牌军多与蒋介石有隙，还有一些自发的农民武装。而我们军委的同志都有一定关系能够接近他们，因此，有条件发动兵变。第三步是兵变成功后，将各县队伍拉到洛阳集结，统一整编，然后向西部崤山游击，建立革命政权。

1931年初，按照军委的统一部署，同志们立即分头行动。

杨松柏与郭显坤分工负责做樊钟秀旧部崔帮杰（崔英奇）的工作。

为了完成党的使命，杨松柏和郭显坤星夜赶往鲁山、云阳一带去联络崔帮杰。崔帮杰原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命名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亲自提拔的师长，郭显坤的哥哥在未加入共产党之前在建国豫军与樊钟秀关系甚厚。因此，郭显坤与崔帮杰相识，后来，樊钟秀在与蒋介石作战时被炸死在许昌，全军溃败。崔帮杰和卫国柱就拉起一千多人在鲁山、云阳一带占山为王。崔帮杰幼年丧父，由叔父抚养成人，许昌会战时，崔帮杰的叔父与樊钟秀同时遇难，因此，可以说崔帮杰与蒋介石有杀父之仇。崔帮杰性情刚直暴躁，好交朋友，重江湖义气，打起仗来有股拼命的劲儿，得绰号“崔二蛋”。崔二蛋在鲁山一带常与蒋介石的部队发生冲突，更增加了他对蒋的反感。而他驻扎的地区，又是我们起事后向南发展与豫南红军取得联系的必经之地，正好楔在中间。如果能把崔争取过来，或发展成为友军，情况就非常有利，豫南、豫西南、豫西就能连成一片。

杨松柏和郭显坤在鲁山县南的上汤很顺利地找到了崔帮杰。郭显坤就将杨松柏向崔帮杰作了介绍，崔帮杰一听说杨松柏是黄埔军校出身，但与蒋介石不一路，又干过北伐军，便十分敬重。寒暄一阵，郭显坤便按事前与杨松柏商定的计划行事。先从樊钟秀和崔帮杰的叔父之死，谈到郭显坤哥哥

遇难，又回忆了樊钟秀在广州受孙中山委托打回河南的壮举，接着才问及崔帮杰的近况。谈话越来越投机，杨松柏见时机成熟，便朝郭显坤递了个眼色，于是，他们便亮明了身份。见崔无敌意也不反感，杨松柏便侃侃而谈，从时局讲到我党的主张，最后说了准备和蒋介石公开武装斗争的打算。崔帮杰不住地点头。眼看水到渠成，他们便单刀直入：“公开讲明，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请崔兄出山，一块儿跟蒋介石斗。”崔帮杰听罢，伸手抓抓头皮，好半天才冒了一句：“对共产党员，我风闻也有些能人。但是蒋介石有百万大军，你们有多少人？再说，共产党都是文人，能成吗？”

崔帮杰的重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郭显坤便由远而近地解释道：“共产党有文有武。你不是知道北伐时的叶挺？他就是共产党员。现在共产党的干家更多：朱德不用说，你听说过还有贺龙，人家本来是军长，还参加了共产党的起义咧。就咱洛阳来讲，冯亭哥也是共产党，他原来不是你们的参谋长吗？眼前的松柏兄怎么样？也是共产党，北伐中荣立过战功！蒋介石百万大军又怎样，打了这些年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发展越大。”一席话，舒展了崔帮杰的眉头。

杨松柏见火候一到，趁机将军：“咱们这样干，上除国贼，下报家仇，有何不可？崔兄如此顾虑，我们只好告辞了。”崔忿然跃起，伸手拉住杨松柏、郭显坤二人：“老弟，急什

么？咱姓崔的怕过谁？打老蒋是我终生心愿。”并拉嗓门，喊护兵摆酒。同时又叫来卫国柱，一一作了介绍。卫国柱当即表示：“妈的，打老蒋狗日的，决不手软。”酒席上，杨松柏他们又向崔帮杰详细介绍了还有哪些人联合起事等情况。崔帮杰高兴地说：“好吧！愚兄一定和他们一块儿干！”

饭后，杨松柏他们按原计划要求崔帮杰把部队拉到临汝和汝阳南部一带活动，以便联络。崔帮杰爽快地答应下来：“中！中！建国豫军和红军联合起来打老蒋，一定斗败这龟孙子。”

崔帮杰办事爽快，将上汤的善后事宜安排停当后，就带队伍向临汝南部一带活动。杨松柏他们随崔帮杰的司令部走在队伍中间。刚走几十里，前面突然发现大火，崔帮杰急忙派人察看。不一会，士兵回来报告：“是前部点了老百姓麦垛，以壮行威。”杨松柏郭显坤当即向崔帮杰提出，这样可不行。崔帮杰涨红着脸，扯开嗓子大骂道：“妈那个×，想当一辈子土匪！护兵，向前传，谁再烧，老子砍掉他二斤半！”谁知前面刚平息，后面的队伍又将老百姓的房子点着了，又使崔帮杰大发了一通脾气，并让卫国柱亲自到后面去处理。当夜宿营后，杨松柏、郭显坤就白天发生的事情作了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崔部长期没有纪律约束，而且部队成份又杂，如果不整顿，是无法和蒋介石作战的。杨、郭商量后，杨松柏、郭显坤决定先向崔帮杰、卫国柱讲清楚。他们循循

善诱，以理服人：“要成大事、立大业者，必先得人心！得人心者，王也。咱们一块儿和蒋介石斗，军风军纪一定要好，共产党要求部队作到三条：不烧杀，不奸淫，不掳掠。这样，老百姓才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只有老百姓拥护了，才能成大事。”杨松柏又列举了由于苏区老百姓拥护红军，红军经常打胜仗的一些事例，他们听后，赞赏不止，崔帮杰乐得直拍大腿。

两天后，崔帮杰部拉到了汝阳南背孜街、红军营一带驻扎下来之后，崔帮杰说：“松柏老弟是军事干才，科班出身，愚兄十分佩服，就请您帮我整训部队吧！”经商议，杨松柏留下协助崔帮杰整顿部队。确定了联系方法后，郭显坤赶回洛阳，向军委会汇报。

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工作，训练了军事干部，发动了工农群众，宣传、后勤等方面一切准备就绪，“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单等中央一声号令，立即举行暴动。

1931年6月，淞沪危急，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由南京迁到洛阳，林森等人已先行到达，筹划迁都事宜。中央鉴于形势突变，力量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指示军委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斗争策略，推迟洛阳暴动时间，一部分人员转到太行山区，相机行事，一部分去鄂豫皖苏区学习，史慧丰奉调回中央。在此之前，杨松柏在帮助崔帮杰整理了部队之后（三月间），就先期奉调到许昌特委，

以省互济会特派员的身份，去豫中农村巡视，指导农民运动。

五

1931年初，根据省委指示，许昌特委改为中心县委（亦称豫中区中心县委），张本（现名刘晋）任书记，杨松柏来后任常委。

这年春，豫中各县因去秋水灾，广大农民陷入“无衣无食的饥荒”中，而地主豪绅仍无休止地盘剥。于是，中心县委决定，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抢粮、分粮、抗捐、抗债、反压迫的斗争。杨松柏被派到叶县指导农民运动。他首先帮助县委制定了抢粮、分粮、抗债、要饭吃、要衣穿的斗争计划，还亲自到叶县东部发动农民，很快联络了邓李、龚店、坟台、城关等镇和廉村附近的大部分村庄的农民，于1931年4月成立了“光蛋会”。

成立“光蛋会”那天，叶县东乡各村的两千余穷苦农民汇集到廉村报恩寺。杨松柏代表中心县委讲话。他详细地介绍了苏区的穷人是怎样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用浅显的比喻说明穷苦人只有拧成一股劲跟官府老财斗才能有活路的道理，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叶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子健也讲了话。“光蛋会”又推举地下党员胡营当会长，议定了“光蛋会”的任务：一、抢粮吃，不能等着饿死；二、要求政府减免粮税，发放赈济，如不答应就抗粮；三、不许地主利用年馑抢夺土地。

为了落实县委的春荒斗争计划，杨松柏亲任叶县东乡总指挥，以“光蛋会”员为骨干，动员了东乡数千农民，利用农历四月初八叶县庙会，警丁进城赶会之机，抢了焦庄粮库近百万斤粮食，取得了春荒斗争的第一个胜利。在这一胜利鼓舞下，东乡农民抗粮、抗捐、抗债斗争普遍开展起来。对于为富不仁的地主老财，“光蛋会”就组织外村的农民借粮“吃大户”（抢地主老财的粮食又不让其摸到底细的一种斗争方式）；二郎庙的“光蛋会”员痛打恶霸镇长；余庄的“光蛋会”打死了官府派来催捐的“衙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进攻鄂豫皖苏区，强行摊派民夫抢修许昌至南阳的公路，无代价强占民田，向农民索款，克扣民工赈粮，引起民工们的不满。杨松柏等同志便因势利导，深入民工中揭露反动派罪行，组织民工以要饭吃、要赈粮为条件进行经济斗争，从而有计划地转入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修路民工与护路队发生武装冲突，举行罢工。他们还散发了近两千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传单。为此，反动当局大为震惊。

杨松柏还和李子健等同志深入到修治沙河的农民工中进行活动，发动民工抢赈粮。流经叶县境内的沙河段每年到雨季就泛滥成灾，地主老财们便以治河为名，成立了由地主老财为委员的治河赈济委员会，征摊了一大批粮款，宣称每个民工一天付给二斤麦子，实际上拖欠不给，粮款尽肥了赈

济委员们的私囊，对此，民工们敢怒不敢言。杨松柏等同志便启发他们的觉悟，最后，民工们一举抢光了十里铺粮仓的赈粮，吓得担任赈济委员的绅士们一个个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农民们轰轰烈烈的抢粮斗争震慑着地主老财，吓坏了城乡劣绅。东乡的地主多次告状，说“光蛋会”的活动是“农民造反”。反动当局遂对“光蛋会”进行武力镇压。光蛋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光蛋会”的斗争虽然遭到镇压，但杨松柏在这里播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种子却在叶县东乡扎下了根。骨干会员姚元生、胡雪、胡改等二十多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光蛋会”力量雄厚的廉村、姚王、牛王庙及后崔等村镇成立了中心团支部。

许昌中心县委在1931年春发动的卓有成效的“春荒斗争”，对豫中各县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连续布置发动了麦收斗争、秋收斗争、年关斗争，持续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

1932年上半年，许昌中心县委成员只有书记张本和杨松柏两个人。杨松柏本来在1931年下半年经中央巡视员决定不再任中心县委常委而专门担任巡视员，而实际上杨松柏除担任艰苦的巡视工作外，仍然兼任常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常扮成卖烧鸡、卖香烟的小贩，频繁活动于豫中各县城乡。

1932年7月，许昌中心县委决定在“以叶县、西华的临颖为发动中心”，开展拾秋、抢粮、分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杨松柏再次来到叶县，领导东乡、南乡、北乡六个支部先后发动群众抢了坟台镇、夏李寨等处地主的粮食。

1932年8月，因省互济会负责人张乔、团省委书记李寿正叛党告密，河南省委和各地的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在与上级完全断绝关系的情况下，张本（刘晋）、杨松柏等仍在豫中地区坚持革命斗争。12月间，前届省军委的张振亚（张存实）到许昌见到刘晋，讲了省委遭到破坏前他已去上海，并谈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之后，让杨松柏在许昌坚持工作，张振亚便带领刘晋等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豫中情况并研究成立新省委问题。

六

1933年1月初，中央派吕文远（李亚英）、刘晋到达许昌，在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吕文远任书记，刘晋任组织部长，杨松柏任巡视员。省工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确立了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支援苏区红军反“围剿”；加紧抗日反蒋宣传；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

1月9日（农历1932年12月14日），省工委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国际十二次政治决议及中央指示信，并具体讨论了如何迅速传达到各区委及基层支部。省工委要求分赴各地传

达的同志应抓紧时间整顿、恢复各地的党、团组织，并对当前的工作及今后斗争逐步引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的轨道。会后，杨松柏被分配去舞阳、西平，吕文远同志亲自去许昌、叶县。

鉴于杨松柏对豫中各县情况熟悉，省工委书记吕文远就让他先到叶县去巡视并接洽关系。杨松柏到叶县后，先后同董锡芝、段永健、段永胜、张式虚以及龙泉寺学校的几位教员同志接了关系，了解了情况，谈了工作，并物色了兰德修为省工委第一个跑上海中央的交通员。

1月中旬，杨松柏离开叶县，在“大雪无路，年关迫近”的情况下，又到舞阳、西平，26日（农历1933年正月初一）回省工委汇报了巡视情况，并写出了详细汇报提纲。

在舞阳，杨松柏详细考察了该县政治经济状况、党的组织情况、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在舞阳南乡召开了该区委约六十名党员参加的会议，在东乡成立了一个特支，并对今后的工作及年关斗争进行了具体布置：以南乡为中心组织拳头社（农民组织）；组织拜年会、要饭团，以走上分粮抢粮道路；组织红军连、红军排，以扩大宣传。

在西平，杨松柏帮助建立了工作委员会，张国兴任书记。杨松柏根据西平的实际情况，具体布置该县：恢复原党、团组织，规定支部开会时间；开展工运工作、饥民工作（组织乞丐团，要求县府放赈）、铁路沿线的农村工作、学生运动，

并要求在旧历1月中使党团组织有所发展。

2月间，杨松柏又到西平、漯河、临颖、郑州巡视，具体检查年关斗争情况，并且布置各县在春荒中应如何开展分粮、抢粮斗争。在郑州，他和豫丰纱厂的原互济会成员张丙戌接上关系后，经谈话，杨松柏发现张的意志有些消沉，便决定该处党组织由工作较积极的张治平负责。

3月间，省工委又派杨松柏去豫西巡视指导工作。自1932年下半年省委遭破坏后，洛阳中心县委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豫西的一些党员同志虽然坚持活动，但“如失掉母亲的幼儿一样，无人照管，又如同无边大海中夜航船儿一样，无人导航”，日夜盼望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因此，省工会及时派熟悉豫西情况的杨松柏前往巡视，帮助恢复党团组织。在省工委的正确领导和杨松柏的具体帮助下，建立了豫西中心县委，恢复和重建了五个区委、二十五个党的支部（党员二百多人）十三个团的支部（团员一百三十多人），还恢复发展了二百多名互济会员，建立了共有二三百人枪的革命武装（游击队、义勇军等），同时提拔了一些新干部充实到各地党、团、群众组织中去。经过杨松柏五十多天的艰苦努力，豫西党的组织及其他各项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杨松柏在豫西巡视的最后阶段正赶上“红五月”。他亲自组织领导并参加了洛阳党团组织、群众团体纪念“五一”

节的活动。在此之前，中央苏区革命互济会于4月12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章程》和《救济困难群众案》等提案。4月底，中央派人到洛阳传达会议精神，杨松柏在洛阳县一小主持召集了会议，有三十多人到会。

5月间，杨松柏胜利地结束了豫西工作的巡视，准备启程回许昌和省工委汇报。但因“红五月”的群众革命运动异常活跃，反动统治势力十分恐慌，加强了警戒、盘查，杨松柏无职业又无合法的身份证件，上火车都有困难。为了使杨松柏安全回到许昌，赵介发通过“河洛通讯社”编辑兼外勤记者张剑石，给杨松柏搞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河洛通讯社采访员”的证明，使杨松柏顺利返回许昌。

5月中旬，杨松柏回到许昌后，随即向省工委写了较详细的书面巡视报告，把五十天来对洛阳、宜阳、洛宁、嵩县、新安等县的政治经济状况、党团组织状况、过去工作及一般同志观念等情况的考察以及豫西党团组织的恢复整顿情况、对目前各项工作的布置等向省工委一一做了具体汇报。随后，工委会通过检查，肯定杨松柏的豫西之行有“很显著的成绩”。

七

回到许昌后，杨松柏便立即投入贯彻落实省工委“关于开展‘红五月’工作的决议”的热潮中，他参加了许昌城区

区委召开的北乡民众代表会等活动。工委会在5月18日检查了红五月前半个月工作之后，准备与杨松柏专门开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布置豫西下一步工作，不料第二天早晨杨松柏在从乡下开会回来的路上被捕，使省工委的工作蒙受了重大损失。

杨松柏被捕后，关押在国民党许昌县署监狱里。国民党当局早就听说有个高个子大眼睛身份不明的人经常出没于豫中城乡，又从他身上搜出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便将他作为“要犯”严加看守。党组织虽经多方营救，均未成功。

敌人对他进行严酷的审讯。问他的身份时，他斩钉截铁回答：“我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党组织情况，他厉声说：“天下的穷人都是共产党，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便对杨松柏动用了多种酷刑。暴徒们用钉满铁钉的竹板打得他皮开肉绽。墙壁上都溅满了血点，昏过去又用冷水喷醒再打。但是，杨松柏宁死不屈。多次审讯，杨松柏都是这样回答：“老子是共产党员，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点情报，万不可能。”“你们别痴心妄想！真正的共产党是决不会屈服的！”“要杀要砍，由你们的便。”

杨松柏在许昌被关押二十多天，刑讯多次。敌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仍一无所获。6月15日，杨松柏等八位革命同志被押往国民党河南省府开封。

杨松柏被押解到开封后，时任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府

主席的刘峙，听说杨松柏是黄埔军校出身，便亲自审讯。刘峙当初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后来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他深知共产党内有许多出众的人才，便设圈套，妄图软化杨松柏的意志，打开缺口，从而将我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审讯时，他故作关心姿态，拿烟倒茶，非常客气。始而故作惊讶，说什么他这个黄埔军校的大队长没有照顾好学生，致使杨松柏误入歧途，他一定设法相救。继而又说什么他为河南地方官，杨松柏是河南人，应为桑梓服务，希望出来共理河南大事。最后又以名利相诱，说什么我给你一个少校参议官做，月薪一百多元，有护兵、有公馆，过着舒适的日子，不比饮弹长眠好得多吗？你还年轻，日子长着呢，切勿拿生命开玩笑，我这都是为你着想，望好自为之云云。

落入敌手，杨松柏自知身不能免，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开始，他还耐着性子，与刘峙辩论革命是非，乘机宣传我党政策，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诚然你我有师生关系，应该合作，但如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你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而我则要继承北伐精神，革命到底！”“你若真为河南民众着想，就该与蒋介石决裂，投到红军里来，你若珍惜我的才干，就该放我出去继续为劳苦大众服务，建设一个新中国。”杨松柏刚强不屈，据理抗争，刘峙不气不怒，仍存幻心。当杨松柏后来听到刘峙以死相威胁，以利相引诱时，再也按捺不住，厉声喝斥：“共产党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你就死了心吧！”接着大骂刘峙是黄埔军校的败类，是蒋介石的走狗，是反革命刽子手，是河南人民的死对头。刘峙机关算尽，黔驴技穷，最后对杨松柏下了毒手。

1933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将杨松柏杀害于开封京门外，就义前，杨松柏大义凛然，向沿途群众慷慨陈词，宣传我党主张，痛斥刘峙为祸河南，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最后，从容地走上刑场，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杨松柏牺牲后，他的同志、他的亲友没沉沦于悲伤的泪水之中，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投入战斗，去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杨松柏同志已经牺牲八十七年了，八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安居乐业、当家作主，先烈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而献身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东方。杨松柏烈士的忠骨虽不知葬埋何处，但家乡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杨松柏烈士永垂不朽。